

知识史与生活史

——口述史研究的理论转向与实践策略

牛 乐

内容提要：当代口述史研究没有清晰的学科属性。口述史不能被视作历史书写的补充，而是具有能动性的知识生产形式，体现为动态的研究面向与实践策略。在口述史的意义世界中，知识史和生活史的叙事互构、互涉，表征了多元的生活世界本身，是对于生命情态伦理化、意义化的确证。

关键词：口述史 口头传统 知识史 生活史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大量从自然科学领域移植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概念一样，口述史研究同样体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整合与实践。在长期发展中，口述史的研究面向从历史事件转移到人自身以及生活世界，具备了深刻的哲学、人类学（包括心理学、语言学）和社会学内涵。

在宏观层面，口述史研究是对人类口头文化传统被意义化、价值化的呼应，暗合了人类反省精神和伦理思考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持续深化，亦体现了人类型塑和建构自身文化价值的实践路径。从微观角度思考，口述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过程体现近当代人文学科内质的裂变、分化与能动实践，亦表征了其所代表的人本价值观与脱离生活世界的文本权力的话语对抗。

就学理而言，口述史研究拥有充沛的学科交叉性和实践动能，这使其自身具备了某种介入社会事实建构的行动者特质。与此相应的是，作为一种受制于互动情境的质性研究，对于口述史的反身性思考、意义论辩和价值臧否亦同时展开，其本身也面临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策略方面的持续提升，这符合其多元化的学科基因以及内在的人文活性。

基于此种考虑，此项研究不是为了厘清任何学术概念，也无意强化学科壁垒，而是以口述史研究的一般形式和当代发展为基础，立足于口述史研究的中国实践，主要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口述史研究，对其可能涉及的理论建构、特殊机制和实践策略进行分析。

一 口述史研究的理论整合与转向

（一）口述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

在当代学术研究领域，作为历史学的口述史学和作为文化学的口述史有不同的研究面向，学术范式

和理论体系亦存在差异。就口述史学的一般特征而言,其符合历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即以时间性为主轴,对于人、历史事件和社会历程的分析,亦包括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对人类活动整体的关注以及相应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相对而言,作为文化研究的口述史被广泛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体现了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特征以及社会实践理念。

从学科属性判断,口述史学研究将口述材料作为特殊形式的文献资料(口碑史料),在此基础上以历史事件、社会发展进程为线索展开分析,具有鲜明的历史学学科特征。而作为文化研究的口述史则将口述材料视为意义展开的空间,是文本分析、文化阐释与文化志书写相结合的综合实践,并不能形成稳定的学科内涵。从学理角度分析,二者的差异主要在于研究者不同的历史观、价值判断和意义取向,亦包括对于口述资料的不同定性以及研究过程中差异的解释策略和行动策略。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作为文化研究的口述史与口述史学体现出共同的跨学科特性,二者的研究范式亦时常形成互动。如果深入考察,口述史学研究的理论正处于持续转向之中,主要表现为试图淡化原有的历史逻辑和价值体系,表现出由考察“事实”转向寻求“意义”的范式演进,故不能被简单视为文字历史的补充。而作为文化研究的口述史研究亦致力于解构自身封闭的文本意义体系,将研究视域和实践领域扩展到广泛的社会文化空间,故不能被认定为一门彻底的文化解释学。

尽管当代的口述史研究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凸显了学科的交叉性和范式多样性,但是其内涵仍体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对历史事实、文化事实和社会事实的共同关注,并因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应用面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实践路径,一是试图确证某种文化事实的解释路径,二是试图建构某种意义体系的实践路径。总体而言,突破历史研究和语言文本研究的局限,整合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从人的生命样态展开,从社会关系网络中理解历史和文化,正在成为口述史研究的共性特征和发展趋势。基于这个理由,无需对口述史研究本身划分任何意义的鸿沟,仅需要探讨其不同的研究面向及差异化的研究策略。

(二) 口述史与口头文化研究的内涵同构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口述历史与口头文化研究有类似的学术基因和理论内涵。在长期发展中,二者基于同样的人文背景,借助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进入了当代文化研究的领域,在历史学、民俗学和文学领域形成了交叉学术关系,共同展开了口传语言文化丰富的意义世界。与此同时,基于人类文化难以逾越的思维结构,口头文化常被作为与文字或书写文化对立的范畴进行考量和论辩,并在意识形态领域演化为诸如“文明”和“野蛮”的价值对立,在文化研究领域形成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①的话语对立。

尽管早期的口述史与口头文化研究不属于同一领域,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是二者对于录音机和“声音”记录共同的迷恋,其显然带有对纸本文字和印刷文化的厌倦,而这种对于“历史—人—生活”的意义建构与感官化理解则体现了某种共同的文化内涵。在此意义上,口头文化极有理由与文字文化、图像文化一样成为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载体和传播媒介,这是其无论怎样发展都依然保留“口传”的基本形式以及“口头”这一生命表征、情感内质和声音意象的深层原因。

^①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首先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这对概念。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有学者如此区别文字历史与口述历史的关系：“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①这一通俗但颇具内涵的解释将问题引向了口述文化的感官性和生命特质。在口头诗学研究领域，此种特质被进一步强化，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认为：“口头诗歌始于声音，口头诗学则回到声音。”^②纳日碧力戈认为：“非文本的口述有文字表达所不及的优势：身势、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生动地传达寓意，包括大量直觉。”^③可以看到，身体性、感官性的文化表达事实上成为口头传统最重要的意义潜质。

作为人类生命样态的确证，口头文化是人类诗性智慧的表征，其蕴含的文化基因信息富有增殖的活性，具备结构和能动的双重解释潜力。作为一项质性研究，口头文化研究致力于对人类文化根本形式的追溯，试图在语言符号和现实世界之间建立某种意义关联，因此可以认为，口头文化研究的发展就是从符号世界到生活世界的理论实践。

此外，不论口述史研究还是口头传统的研究，均指向一个相对集中的文化事实，即“传统”。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关于“传统”一词的理论阐释影响甚广，其“代代相传”^④的基本特征将“代际”作为文化传承的时间单位，具有浓厚的社会历史学内涵。希尔斯认为人类所有的精神范型、信仰或思维范型、社会关系范型、技术惯例、物质制品或自然物质，都可以通过某种规范的时间单位塑造而成为传统。^⑤可以看到，尽管其并不排斥物质文化成为传统，但是基于这种理解，自然的、精神的、无意识的文化事实无疑具有了优先的价值，而非物质文化作为传统的表征，被认为是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文化事实。从希尔斯的上述传统观可以看到其浓厚的人本思想和谨慎的反理性主义内涵，这种以人的自然伦理为价值核心，以个性化、而非普遍意义的知识范型为基准的理论影响深远，其本身也成为文化后现代性的重要表征。

比较重要的是，不论口述史学研究还是口头文化研究都十分注重写作文本的“真实性”。差别在于，口述史学研究关注的是文本所透露的事件的真实性，而口头文化研究则注重文本所反映的文化事象的真确性。这种区别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学科间学理机制和研究面向的差异。

不论基于何种目的，口头文化和口述历史的兴起有相对一致的内涵和价值指向，即对于人类固有思维结构和心智、创造力的追溯，暗含了人类知识形成的原动力和建构过程。与此同理，口头传统的身体性和感官性亦表征了为机器理性控制范围之外的人类世界本相与文化事实，甚至是生活世界本身的文化表征和话语形态。如朝戈金所言：口头传统关涉人类认识世界和呈现世界的方式，是人类观念传承和知识传递的过程和结果。^⑥在此，信息、媒介、传播这些描述当代文化的抽象概念才有可能被付诸于对人性的理解。

① 常建阁：《对口述史价值的思考》，《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11期。

② Dennis Tedlock, "Toward an Oral Poe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1977(3).转引自朝戈金《口头诗学》，《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6期。

③ 纳日碧力戈：《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④ 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⑤ 同上书，第17页。

⑥ 朝戈金：《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口头传统》，《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年第2期。

(三) 口述史与口头文化研究的理论转向

除了历史学研究传统的显性影响之外,当代的口述史研究已经具有了深刻的语言学和社会学内涵,在学理上与口头文化研究实现了深度整合,成为一项基于口头表述、整合历史研究与共时分析、兼顾理论阐释和社会实践的文化综合研究。

在口述史与口头文化研究共用的诸多理论方法中,解释学方法既是一种哲学技巧,也是一种人文传统,其渊源甚至和口头文化的发生同样古老。西方解释学理论由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 E. Schleiermacher)确立,经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不断完善,成为一种针对普遍意义阐释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又将其提升到了哲学本体论高度。更为重要的是,尽管通常用于翻译理论或文字文本研究,哲学解释方法对于口头语言、图像、身体、仪式的研究同样有效。在实际研究中,当代解释学理论整体性、能动性的理解方法比任何一种单一的学科式理解都更具深度和实效,并以其深刻的人文性制衡了过度理性主义在文化研究中的弊病,这应该是解释学对于文化研究最大的贡献。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学理论对于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解释人类学理论影响深刻,后者继承并发展了前者“意义之网”的结构概念,但是又融入了解释学的理论方法和学术传统。具有建构意义的是,格尔茨对行动理论和解释学理论的微妙结合,构成了“深描”(thick description)这一经典人类学理论,并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为差异性的文化解释提供了合理的前提和实践场域。此外,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神话学亦对当代口头文化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文学领域,口头文化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20世纪以来,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批评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的文学理论一度使语言文化研究形成以文本为中心的理论分析范式。此后,延续至今的符号学和叙事学研究逐渐突破了文本中心主义的束缚,指向封闭的文本以外的世界,使语言文化研究实现了从“语言范式向话语范式的转变”^①。在此过程中,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拉康(Jacques Lacan)、巴特(Roland Barthes)、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学者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亦成为口头文化研究重要的理论工具。十分重要的是,上述理论同出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体系,但是又呼应了近代解构主义哲学思潮,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征。

此外,受人类学研究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当代民俗学的口头文化研究逐渐趋向于对非语言文化的分析,从“演述人、文本、传播、接受、语境等不同环节”^②充分展开,将文化解释范围拓展到交流和传播场域,使口述活动语境化、事件化,体现了口头文化研究从文本到言说事件的转向,亦使口头文化研究突破了语言学共时研究的局限,延伸到生活世界和社会关系网络。

从近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多次理论转向我们可以看到,对意义的理解 and 实践贯穿了从文化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探索路径。就口述史理论的发展而言,从经验研究转向意义实践,从事件面向转移到生活面向的过程体现了深刻的文化建构价值。从发展趋势来看,尽管当代口头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元的向度,但是仍试图联结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之间的缺环,存在建立某种普遍分析模式的潜在意图,只是其

① 周宪:《文学理论:从语言到话语》,《文艺研究》2008年第11期。

② 朝戈金:《口头诗学》,《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6期。

理论建构已经逐步向行动效果转化,形成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有机结合的理论转向。

二 口述史研究的中国实践与理论建构

中国的口述史研究始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广泛的社会调查、历史调查,革命回忆录以及“新四史”活动中对口述资料的整理。^①改革开放初期的口述史研究主要以人物访谈和回忆录为主,局限于口述资料的档案价值和求证历史的研究维度。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口述史研究开始系统化发展,但是仍保持了特色鲜明的历史研究范式,杨雁斌、沈固朝、焦鸿根、屈雅君、鲍晓兰等学者相继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除译介国外口述史理论成果之外,多数学者致力于在历史学科内部讨论口述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以及口述史的学科定义、功能、应用价值、工作规范等问题。值得关注的插曲是1998年在西安举行的“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在学界形成了阶段性的口述史研究热点。

21世纪以来,国内的口述史研究开始呈现多学科理论交叉互动的发展态势。2004年,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在苏州召开。同年,杨祥银撰写的国内第一部口述史专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②出版,标志着国内的口述史研究进入了本土化发展和实践的新阶段。从知网数据库的统计来看,国内的口述史研究成果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明显增加,至2015年达到了高峰,其中熊月之、曹幸穗、王铭铭、王尧、王宇英、岳庆平、傅光明、程中原、陈献光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尽管史学领域的理论探索和争议始终在持续,口述史研究的理论整合与分化已成趋势,多数成果已经从自上而下的宏大叙事转向自下而上的民众叙事,其关注点从历史事件转移到社会现实,致力于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如王铭铭辨析了“口述史”和“口承传统”的差异以及以事件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关于“人生史”(life history)研究的主张^③,试图阐明其口述史研究的“人学”定位,这一主张为深陷文本泥潭的口述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朱义明提出事、人、环境三个维度,行动、内容、对象、时间、空间五个要素,真实、觉识、关系三个向度,试图概括当代口述史研究的一般理论范式。^④周晓虹从社会记忆与个体生命的样态入手,阐述了口述历史基于社会结构与个体历程相交织的建构机理。^⑤巴莫曲布嫫将“史诗演述传统—表演事件—受众—演述人—研究者”五个在场整合为“演述场域”,解构了口头文化研究普遍的二元对立模式,揭示了意义生产的复杂行动特征,这一理论主张对于口述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⑥

与口述史学研究的定位及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文化口述史从一开始就与口头文化研究相结合,致力于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整理,其早期成果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与民俗学领域。民间文学领域的口头文化研究主要基于少数民族史诗的调研展开,包括20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的两次史诗“生产运动”^⑦,此

① 熊月之:《口述史的价值》,《史林》2000年第3期。

② 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③ 王铭铭:《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

④ 朱义明:《口述史的概念厘定与研究向度》,《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⑤ 周晓虹:《口述史与生命历程:记忆与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⑥ 巴莫曲布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⑦ 巴莫曲布嫫:《以口头传统作为方法:中国史诗学七十年及其实践进路》,《民族艺术》2019年第6期。

项研究至 20 世纪末获得了快速发展,至今仍在持续推进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外,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内民俗学领域的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安德明等学者对西方民俗学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演述理论等三大理论的译介和实践,拓展了国内口头文化研究的视域和理论范式,体现了鲜明的学科交叉性和前沿性。至 21 世纪,中国的口头文化研究已经充分与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形成互动,持续拓展其实践领域,并在发展中间接带动了口述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近年来,一系列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对中国的口述史研究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口述史研究和口头文化研究共同建构了一种新的范式,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这一领域的口述史研究有比较明晰的价值取向,其研究成果有较好的应用性,不仅具有文化史意义,亦兼顾了文化的传播价值,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社会整体实践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传承人口述史很快成为一个开放的研究平台,吸引了国内诸多学术领域的学者参与,凸显了多学科交融的研究范式,其中冯骥才、向云驹、张士闪、马知遥、王拓、郭平、孔军等学者著述颇丰,有效介入并推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

2011 年,冯骥才主持的“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建设及口述史方法论再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2013 年,阿来主持的“甘青川藏族口传文化汇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2015 年,天津大学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成立。2016 年,冯骥才等主编,郭平、祝昇慧、冯莉著《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①出版,内容涉及传承人口述史的定义、认识论及方法论,建立了传承人口述史研究的总括性理论框架。此外,2013 年,冯骥才主持的“中国唐卡文化档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立项。2020 年,笔者主持的“中华传统伊斯兰建筑遗产文化档案建设与本土化发展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上述研究衍生了“文化档案”这一新的成果体例,重新审视并吸收了口述史学的诸多价值优势,为文化遗产研究和口述史研究提供了相互支撑和策应的发展空间。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口述史研究中,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使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被系统地收集、整理、归档,相应的前沿理论成果和理论工具被译介,并在实践中发展形成了鲜明的本土话语,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构价值。可以看到,中国学术界以民间文化资源为基础的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实际上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维度,即以人为伦理中心,以人的生活世界为文化发生、传承的场域,以人的创造性劳动为价值基准的综合研究范式。

在口述史的本土化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探查知识史与生活史的理论互构。“生活世界”(Lebenswelt)是当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和基本世界观,也是理性向生活世界回归的学术转向。胡塞尔(Edmund Husserl)将其解释为与科学世界相对的、“非主题化”的日常生活世界。^②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所谓生活世界,乃是积淀在语言中的各种“背景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③其进一步论述:“生活世界同时构成了言语情境的视域和诠释成就的源泉。”^④这一观点在语言、知识和人的社会活动之间建立

① 冯骥才等主编,郭平、祝昇慧、冯莉著《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2016 年。

② 张廷国:《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及其意义》,《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5 期。

③ 艾四林:《哈贝马斯论“生活世界”》,《求是学刊》1995 年第 5 期。

④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第 27 页。

了深刻的理论关联。

在口述史研究中,生活世界不能被理解为现实世界所有具体事件的集合,而是与人的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由种种互动实践构成的关系场域。本文借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概念,试图说明其内在的能动性和策略性。

知识史研究在西方有始自古希腊时代的悠久传统,但是直到20世纪末才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近代知识史研究与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的知识社会学研究关系密切。当代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积极推动了知识史研究,并出版了《知识社会史:从古登堡到狄德罗》(2000)、《知识社会史: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2013)等重要论著。^①知识史研究学者通常考察知识与社会个人的关系,甚至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的知识发展史。^②从人类学视角关照,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概念化表达,知识来源于人类基本的心智结构和实践能力,与历史学领域和科学世界的叙事一样,知识史的叙事在民间文化中具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

相对于知识史研究的理性传统,生活史研究带有更丰富的文化意涵,呈现为科学与人文互证、视野融合、范式转换的过程。在自然科学领域,生活史研究主要是对生物个体生命历程和习性的研究。社会科学界对生活史的研究较为丰富,总体上是对哲学界关于生活世界精神性建构的回应。人类学对生活史的研究与民族志研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文化变迁历程与个人生命样态的学术化综合,并融入了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理论。史学界对生活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则是近年来对风俗志研究的拓展。^③近年来,民俗学界对生活领域神圣与世俗对立关系的解构,“从传承事象研究转向生活世界中的‘经验、知识和表象’构成的常识体系的研究”^④亦成为学术热点。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口述史研究中,知识史与生活史的互构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理论范式,这种互构契合了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形态、社会结构及文化语境,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特殊性和实践性。客观地评价,这并非某种刻意经营的话语形式,而是在多元化的实践中自然生成的理论范式。相对于一般口述史研究,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最关注的并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是知识观念和生活方式共同呈现的文化意义与实践潜能,具有鲜明的社会面向。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实际需求,以知识持有者的表达为参照系和逻辑中心,对差异性知识和生活方式的概念化分析成为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核心理念。

基于特定的研究领域,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对象只可能是生活世界中具有某种特殊知识和生存状态的人,其关注点在于“差异”,具体来说是个体的知识结构与生存方式的特殊性,包含某种特殊行业知识概念化、制度化的建构过程,亦包括这种知识生成的历史背景、生活情境以及生产过程。

传承人的知识体系并不是固化的、一成不变的信息储备,而是表达为一系列持续积累和生长的经验。除一些程序化的技术知识之外,它还包括在本民族、地域、家族、行业中传承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故事,也蕴含个体和集体的世界观、道德观,以及生活经验、审美经验和创造经验。这些信息与其生活的世界存

① 陈恒:《知识史研究的兴起及意义》,《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1日。

② 彭继红:《知识史观:一种新的社会历史方法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③ 胡悦晗、谢永栋:《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史林》2010年第5期。

④ 王晓葵:《灾害民俗志:灾害研究的民俗学视角与方法》,《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

在持续的映射关系,基于独特的心理素质和思维结构编码生成,在不同的访谈情境中被表述。它虽具有一定的历史内涵,但是更具现实指向。因此,这一类型的口述材料并不能成为检验或支持预设问题的事实依据,而是与现实情境互动、与生活世界互构的意义世界。

与民俗志范式和社会史意义的生活史研究不同,传承人的生活史研究有其特殊的关注点,主要研究其独特的生命历程与地域社会生活的互构过程。故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关注的往往不是长时段历史中广角化的宏大叙事,而是对日常化、碎片化信息的整合,常表现为微距、微观的生活化叙事,更容易凸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民性、多元性和活态性。

在传承人口述史的意义世界中,知识史与生活史并不是两种各自分立、缺乏关联的叙事线索,而是对立的话语事件和权力关系的表征,代表了潜意识层面结构与能动的互生关系。在生活世界中,二者表征了“礼”与“俗”的互动在民众生活中形成的稳固的心理图式。从深层心理机制分析,这种二元关系同样是人类先天心智结构和语言模式在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建构。

在传承人口述史的信息中,知识史常表征文化的纵深感和体量感,生活史则渲染文化独有的情感特质。知识史与生活史的信息常“竞争性”地表述事件和意义,共同构成个体、行业、社会的历史图景和生活图景。除必要的时间线索和历史要素之外,其意义体系由二者的叙事关系构成,二者相互指涉,互构为一个开放的意义整体。

三 口述史研究的实践策略

综合分析,口述史研究由访谈活动和口述史的文本研究两部分构成,二者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口述史研究的一般范式和实践模式,此模式在诸种类型的口述史研究中具有普遍意义。就研究方法而言,口述史访谈的一般框架基于预设的问题自上而下展开,希望从获得的经验材料中求证问题。已经在口述史访谈中普遍运用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则正好相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强调行动的重要性,追求概念和问题的分析生成,突出了经验材料的可归纳和解释效果。在实践层面,如果将口述史访谈作为一个整体事件,则其既表现为解释过程,也是行动过程。深入分析的话,此过程尚存在更复杂的中间环节,表现为以一系列事件为关联,在特定语境和知识生产场域中发生的互动关系,这是构成其实践策略的事实基础。

需要关注的理论问题是,口述史的研究过程并不是对科学事实的发现过程,而是充满深刻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的实践过程。基于口述史研究复杂的场域特征,口述文本生成的场域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主客二元互动的场景模式,需要关注的问题不仅是语音和口述资料自身,也应包括访谈行动乃至整体的访谈事件。在实践中,对此种整体活动的理解、参与,与访谈对象的交流乃至对事件本身的反省,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分析过程,而是一个基于灵感的创造过程。这一过程并不会使文本自身的意义解释陷入混乱,反而作为一种行动策略推动了文化意义的生产。

相对于经过反复推敲的文字文本,口述文本常表现出模糊的、多重的言说和解释主体,更容易产生矛盾的解释效果。在此情形下,访谈者和讲述者的合作行动具有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行动观和行动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意义的生成,并赋予口述文本开放的解释空间。

相对于解释策略,行动策略并不是指访谈中的技术策略本身,而是包括发生在访谈活动之前、之后和活动过程中诸事件的整体。行动策略与解释策略形成意义上的互动,本身也会成为解释策略的隐性组成部分。可以肯定的是,口述史访谈中的行动策略对于脱离具体生活情境、漫无边际的文本阐释有相当的制约作用,并有助于和文本元素共同建立一个从符号世界延伸到生活世界的意义生产场域。

(一)意义平面与话语实践

相对于一般的历史研究,口述史研究不仅包含口述文本的历史信息、意义结构,亦包含对访谈活动整体的语境化分析。这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产过程,意味着口述文本不能被捆绑在预设的意义体系中去阐释和理解。基于知识史和生活史的交互影响,讲述者对于文化的表述并不追求时间的秩序感和空间分布,而更倾向于将所有信息压缩在一个浅表的意义平面上,用以呈现某种特定的话语。在实际访谈中,尽管讲述者传达的信息有时杂乱无章,但是结合其所传达的话语内涵,则可以呈现清晰的意义结构,实现更丰富的解释效果。

笔者设计“意义平面”(图1)一词试图说明口述语言文本的象征性结构与事件性质。就学理而言,这既是一个符号学问题,也是解释学问题。确切来说,语言平面是一组被压缩了历史关系、但是相互关联的事件,也是呈现共时语言符号关系的意义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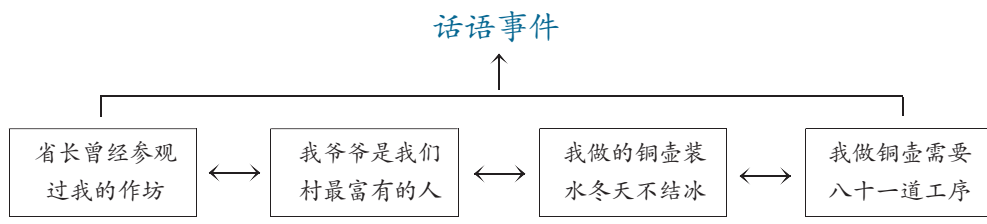


图1 意义平面图示

尽管这可能是对于访谈者预设问题的回应,但是在讲述者的意义世界里,生活史和知识史的信息通常被压缩于同一个意义层面,并形成瞬间的“话语事件”^①。对讲述者而言,这既是由无意识积极构造、用以塑造自身价值的话语实践,也是文化表演的具体形式和实现最大言说效果的策略。访谈者往往采取截然相反的话语策略并积极融入自身的知识、经验和心理预期,尽量去除这种意义平面的信息冗余^②,试图重构其预设的意义结构。这种互动性强化了文本意义的生成和解释力度。

这种基于话语的意义互动体现为生动的交互关系,其间的差异越大,可供解释的信息密度也越大,并会被反馈到访谈过程中,改变双方的行动策略。通常来说,此种话语的互动不仅没有使解释结果趋于模糊,反而激活了整体与局部之间更丰富的互文关系,拓展了更高层次的解释空间,并构成了解释学循环。

解释学循环是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理论的核心观点,他所理解的“解释学循环包括文本但不限于文本”^③,这一观点将对文本意义的解释扩展到了生活世界。作为对文本整体与局部之间复杂解释关系的描述,如

① “话语事件”为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使用的概念,用以描述话语的“事件性”。参见刘欣《保罗·利科的“话语事件”思想》,《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② “冗余”在语言文学领域意指“多余”或“重复”,含有贬义,在信息技术领域指数据的重复存储、编码或备份,以增强数据的安全性。

③ 转引自何卫平《辩证解释学: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的初步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果将某次口述史访谈视作一个整体事件,则其效应不只存在于口述文本之中,亦存在于事件整体中,由访谈者、讲述者与整体事件构成更高层级的循环关系,并且还会进一步延伸,与阅读者的参与和理解构成意义关系。从解释学角度来说,此现象支持了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理论,施莱尔马赫甚至宣称:“我们能比作者理解他自己理解得更好。”^①从符号学角度而言,这种意义层级的跃进亦可以表达为新的能指^②生成的过程,即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所说的意指过程。同时,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口述文本特殊的互文结构和话语特征,也呈现了其富有能动性的生产过程。

(二)意义标出与修辞实践

无论我们如何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内涵及实践价值,其作为当前社会一个具有活力的生产场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此项工作是一个完整的行动体系,涵盖了自上而下的制度与政策设计,也包括自下而上的能动实践,但是作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双向的资源整合与权力互动仍需要具体的行动去推进。在一系列行动策略中,口述史访谈看似为一个中间事件,但是却在整个运作体系中承担重要的功能。它既表现为行动中介,也对种种不可避免的话语对立和价值对立起平衡和转化作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口述史访谈具有鲜明的合作特征,在多数时候,和访谈对象关系的技术性处理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学术命题。因为访谈效果更多受制于双方的话语和权力关系,在文本层面表现为语言结构上的标出性(markedness)^③,具体来说,就是意义范畴的不平衡和对立现象。

标出性作为理论术语于 20 世纪 30 年代由俄国学者特鲁别茨柯伊(N. S. Trubetzkoy)提出,经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发展,近年由中国符号学家赵毅衡进行了再阐释。标出性理论被同时运用于符号学和叙事学领域,本文用标出性理论描述口述史访谈中双方复杂的关系模式。该理论与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的符号学理论具有同样的开放性,均可描述自文本语境至生活场景的关系模式问题,其理论技巧与解释学一脉相承,但是更具实践内涵。

标出性理论将符号关系表达为“正项—中项—异项”三分模式^④,这符合近代解构主义哲学普遍的分析模式和解决策略。中项具有突出的双向能动性,亦类似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中的解释项^⑤,它兼具解释价值及行动意义,但是更倾向于实际的可操作性。

理论意义上的口述史访谈始终在处理这样一个实际问题,即如何调适并转化文化竞争场域中的对立性。这种对立性在宏观上表现为传统与非传统、官方与民间的话语关系,在微观上表现为访谈者和受访者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亦可延伸类比为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位与客位关系。在标出性概念中,中项是正负项交叠的不确定场域,也是标出性得以显现和实践的环境,处理意义不平衡问题的实质就是利用中项标出性的策略问题。

^① 转引自何卫平《辩证解释学: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的初步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

^② 罗兰·巴特称其为第二层的符号系统,即能指和所指共同构成的表意层次(新能指)。参见张静《论罗兰·巴特符号学与视觉传播理论》,《人文杂志》2013 年第 9 期。

^③ 参见赵毅衡《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文艺理论研究》2008 年第 3 期。

^④ 参见陆正兰《论艺术的双标出性》,《思想战线》2020 年第 2 期。

^⑤ 皮尔斯的三元符号关系(triad relation)即由符号(sig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构成的三元表意关系。参见赵星植《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对象”问题》,《中国外语》2016 年第 2 期。

按照符号学家陆正兰的解释,社会实践中的标出性策略就是不断用“命名”式处理“公正”问题。^①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广泛实践即采用了此种策略。无论是代表性项目的分类,还是代表性传承人的确认,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广泛使用的“工匠精神”等词汇,均表达了通过“命名”调适官方与民间的文化权力、均衡利益关系的实践意图。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体系中,传承与保护处于话语的两极,但不是对立的观念,而是以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由人的社会实践关联的符号系统。二者的关系不止体现为语言逻辑,亦表现为实践逻辑,其整体意义通过修辞方法获得动态的平衡,这符合标出性的实践内涵。

在口述史写作实践中,语言修辞技术成为意义标出的策略活动,并且是关键性的实践因素。它既体现在文本素材的翻译、转译、文字记录和归档工作中的客观性和价值策略,也体现为能动的意义生产和知识生产。在实际访谈中,诗性的叙述或者方言化的语言修辞可以呈现隐藏的意义结构,携带丰富的民族志背景和语境信息,故即使不同语种或方言之间的互译也应尽量保留口头修辞风格。这既是口述史研究特殊的语言学机制,也是意义标出的具体实践。

相对于显性的文本内涵,修辞的意义更多隐藏于文本的整体风格之中,在审美和阅读情境中生成。此时的修辞风格不是一个可解释的文本对象,而是某种具有自我言说能力的行动者(actor)。可以认为,正是口头讲述基于个性和灵感的修辞风格,使口述史文本关联了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回归了修辞(rhetoric)这一古老技巧的文化内涵。

(三)意义冲突与意义再生产

在某种意义上,口述文本生成的在场性和交互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尽管口述史文本通常呈现为一个自足的整体,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不论是口述材料、访谈双方还是访谈事件本身都不是不可干预的事实,而是具有能动性的意义生产过程。

在口述访谈中,访谈人与讲述者共同构造了表述情境,这种情境具有偶发性和不可复制性,其决定了陈述内容波动的、不确定的客观性。对于讲述者而言,主动言说、被动言说、无意识的言说、在不同环境下言说,均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和语言结构,亦可能生成差异化的解释结果。基于这个原理,口述史更类似一组不确定的符号意义坍塌(collapse)的场域。为了描述这些冲突的意义符号在其生产场域中的不确定性,笔者借用一个量子物理学的概念——量子坍塌(quantum collapse)来说明不确定的意义符号在阅读者的介入下获得确定性的过程。

以量子物理学的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作为类比,则符号(假定其为量子态)不是某种可以被同时把握其结构和意义的东西,它呈现为不确定的、叠加的模糊状态,但是在观察者(阅读者)的视野中最终会坍塌为确定的状态。坍塌后的符号意义是确定的,但是这一过程却是不统一、不连贯的。

符号学家洛特曼(Ю·М·Лотман)认为现实是由不同的语言组成的具有开放性的世界图景,任何单一的语言都不能完整地表达世界,必须存在两种以上的语言才能保证最小的系统结构的运转。^②这一理论同样巧妙地借用了自然科学原理,将语言世界的动力机制类比为“差异”所产生的相互作用。由于访谈

^① 参见陆正兰《论艺术的双标出性》,《思想战线》2020年第2期。

^② 转引自张海燕、秦启文《文化动力的生产机制——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人和讲述者居于差异的(包括语种、文化、心理预期、意义编码的差异)语言系统中,这种差异使口述史文本不可避免地出现意义冲突的痕迹,成为由分裂的语言系统构成的波动的意义生成过程,形成口述史文本动态的意义框架。

从另一角度看,这种语言系统的差异和对立除引发意义冲突之外,亦有其建构价值。相比文字历史相对清晰的逻辑中心,口述史研究激烈的话语交锋常暗含多种冲突的立场和价值观,但是这些矛盾会相互推动意义的再生产。在此意义上,口述史研究可以被理解为多重语言系统的互动。正是语言系统的多重性造成的意义冲突建构了口述史文本的生动性、丰富性和解释潜力,并赋予其突出的意义再生产特征。

结 语

口述史是关于文化事实的相对性研究,也是具有能动性的知识生产形式,具有可资转化的社会能量。尤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口述史的研究对象是正在生活的人,这一研究对象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约性而具有了特定的价值基准、心理预期与写作面向。应该看到,基于潜在的科学主义精神和社会建构理想,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遗产价值、人文价值和行动意义,已经被充分投射到“人”这个具有差异性、但是象征着普遍伦理准则的行动主体身上,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建构价值。

口述史研究与口头文化研究的价值合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文化的传承与再创造不仅具有理性意义,更具有灵感价值;人对于文化的传承是出自本性,并基于持续的创造能力,人的生活世界则是文化得以不断再创造的生产场域。在此意义上,口述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揭示某种文化事实,而是在理论实践中建构生活事实,它表征了多元的生活世界本身,是对于生命情态伦理化、意义化的确证。

本文系 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传统伊斯兰建筑遗产文化档案建设与本土化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ZD209)阶段性成果。

(牛乐,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王 尧】